

誰與斯人慷慨同

——看「大陸去來」有感

阿老

來臺灣這些年，我曾對臺灣近廿幾年的文藝小說、武俠小說、民初俠義小說、鄉土小說、哲理小說以及戰鬪文學，都作過一個有系統的閱讀，其中又尤以對匪區報導有關的文學作品，更是研讀再三。我有一個感觸，也許自由祖國對文藝的開放與鼓勵，抑或自由地區的生活本來就多彩多姿，反映到作品裏，無論是取材層面、文學技巧、人物刻劃，都較大陸近數十年來的文學水準為多。唯獨有關匪區的戰鬪文學，或許顧忌太多，投鼠忌器，相形之下，顯得格外貧瘠，偶或朋友介紹讀一兩本「好書」，讀起來總感覺作者在隔靴搔癢，更甚者，有些作品幾乎是在一定的公式及術語下進行，令人感覺枯燥、單調，只有主題的整體性，而沒有個別性，對於反面人物的描寫，更是用儘了形容詞，以達丑化的目的。因此，像這類的作品，在直覺中，可以聞一而知十。加之一些有心人士，求好心切，採半強制灌輸，不善誘導，使讀者打心眼裏排斥此類作品，在這種情況下，即使真有一兩本好書，也因得不到編者和讀者的有力支持，不得不打入冷宮。

數年前，凌耿以一個紅衛兵的親身經歷，完成了「天籟」一書，曾造成一時轟動，其主要原因，正是突破了閉門造車、隔靴搔癢的毛病，但很不幸，僅是曇花一現，即因種種原因，而告半途夭折。爾後，拙作「腳印」繼「天籟」熱潮之餘問世，也得數日再版，不想出版社一念之差，精裝後

調價過高，又遭冷卻。

正值戰鬭文學凋零不堪，欲振乏力之際，陳若曦以回頭浪子之姿，挾臺大「幫」之力，得時報鼎力相助，以其細膩的筆觸、敏銳的情感，突破了傳統的條條框框，將大陸的生活、思想如實的融入她的小說，不但使自由世界的人們得以震聾啟聵，更將戰鬭文學帶入了一個新的里程，就這點來看，陳若曦是功不沒的。

然而就陳若曦作品的層面來探討，其內容大部份只限於大都市及知識分子。格局既小，深度和廣度也很有限。更何況他是用小說體裁來表現，難免會使人以讀故事的眼光來衡量它的真實性。

近來由時報連載後又出單行本的報導文學「大陸去來」，可以稱得上此類作品中的一流之作，作者朱君逸先生長期定居美國，此次回大陸探親訪友之餘，足跡遍歷大半個中國，北到荒漠的蒙古大草原，南至山水甲天下的桂林，東到東海之濱，西至嘉陵江畔。更難得的是他每到一處，不是浮光掠影、走馬觀花，而是細細觀察，慢慢品味，了解的對象有幹部、司機、工人、農人。觸鬚所及，除軍人而外，也幾乎囊括各階層。加之他歷年來的旅遊經驗，見多識廣，年逾不惑，思考慎密，定居海外，毫無顧忌，有這些條件作基礎，所寫出來的作品，自然廣度、深度、客觀性、真實性以及時事性，都不是一般同類性質的作品可比擬。由於該文的忠實記載，善用對比的手法（今與昔比陸，大與外界比），以及訴諸理性的敘事論物，其影響力更勝過所有情緒化的反共文章，而能被廣大的讀者所接納。以筆者的工作單位為例，辦公室裏一向是以中央日報及聯合報為主，但當時報連載朱君逸先生的「大陸去來」一文時，時報即成了最熱門報，大家爭讀該文，課餘之暇的話題也多圍繞大陸問題，連帶的我也成了衆人的發問對象。

就一般人的看法，「大陸去來」可謂是最新的資料，其中所報導的，和中國大陸近十數年來的紅色恐怖現象，似乎有了顯著的改變。因此有些人具此推想，四個現代化之後，人民生活將可能有

大幅度改善，鄧小平可能就將中國大陸由「修正主義」引向「資本主義」。就筆者在中國大陸生活了廿三年的經驗判斷，四個現代化以及改變現生活方式都只能是口號、是聽之生津止渴實則遙不可及的梅林，且不說中共內部的權力無以平衡，國內無健全的法律，中共的既得利益者也不肯放棄無產階級專政，試想不能家和又豈能萬事興？再以共黨卅年的發展來看，今日中共的四個現代化，實際上早在文革前劉少奇時代就實行過，套一句共產黨的術語，這不過是「舊瓶裝新酒」是「寫新鞋走舊路」，是「舉的是毛澤東的旗子，掛的是華國鋒的面子，行的是劉少奇的路子，幹的是鄧小平的班子」。由這幾句話我們不難看出一個明顯的問題，即是鄧小平仍沒有跳出共產主義籠罩下的死胡同。而今日的四個現代化也好，趙紫陽的四川經驗也罷，都仍是當年劉少奇「三百一包」（自由市場、自留地、自負盈虧）的翻版，劉少奇走不通的路子，鄧小平是否真能有三頭六臂，闖出一條新道來，實在該打個大大的問號。

然而，朱先生執筆的態度是十分中肯的，就以他「從氣管炎談到男女關係」、「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」，「從新娘出口談大陸女人」三篇而言，可以說對大陸男女之間的問題作了十分客觀的報導與分析，他不但打破了傳統的「一杯水主義」宣傳方式，也明確的提供給我們中國的傳統美德並沒有因共黨的破壞而喪失，貞操觀念與保守的舊傳統，仍根深蒂固的根植於民間，「大陸人民評定一個人的好壞，是把品格，尤其是搞不搞男女關係列為計分的第一因素，男女行為不檢點，會受到鄰里、工作單位及社會各方面的指責而難以立足。好些大陸人民時常說，這是孔子倫理思想的功勞。」

朱先生訪問了三對因工作地點不同而長期分居的夫婦，問他們「長久分離會不會鬧婚變，他們三人異口同聲表示，絕對不會。」這在自由世界，尤其是在特別強調自我及心理學發達的美國，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情，性與色的泛濫，在自由世界即使到犯罪的地步，仍然是「告訴乃論」。但在中

國大陸朱先生說：「我在街頭看到一張告示，有名無聊男子把個等火車的婦女騙到僻靜的地方毛手毛腳，而被判幾年徒刑。」

另一點大陸不會有外遇的原因是「生活在中國大陸上，很像生活在百貨公司的玻璃櫥窗裏，你的言行和舉止都被鄰居和同事看在眼里，記在心裏，注意別人一舉一動已成爲大陸人民的生活習慣。」試想，在這樣的形情下又有誰敢在外「一杯水」，大陸上毫無個人活動的隱私，「人民無遷移的自由」，一旦發生這種醜聞，「想撿個無人認識的地方，去改頭換面自我革新都不行。」

朱先生還有一篇足可供投機商人引以爲戒的是「可口可樂打錯了算盤」，大陸上人口衆多，按理說消費者理應增多，商品的輸入應該是穩賺錢的，可口可樂的老板正是打的這種算盤，然而可口可樂在大陸却毫無銷路，這不只是一元人民幣大陸人民受不了（大學畢業生每月四六元人民幣），還有喝可樂的先決條件是需要冰塊，在大陸除了冬天有天然冰之外，要在中小城市找到一塊人造冰塊，只怕踏破鐵鞋也無處覓。爲此朱先生喝可口可樂的感覺是：「喝起來像喝藥水。」

爲什麼中國大陸連塊冰都找不到呢？因爲其民生的基礎工業跟不上。一項純消費的可口可樂都因相關工業跟不上而如此，其他商品也就可想而知了，更何況大陸百姓薪水收入太低，全國物質皆是統購統銷，想去發大陸財的中外商人，確應三思而後行的。

當然在朱先生的文章中我也有不盡苟同的，譬如在「大陸的叫化子分三類」一文中，將「打抽豐」的也列入叫化子類，實在是「少見多怪」而造成的錯誤。朱先生有幾次吃東西時，因食物不對味或叫得太多而吃不了，「坐在我邊上有位中年男士看見我半天不吃，就問我吃不吃，我說不吃了，他毫不客氣，把我面前的餃子端到他面前，連我的筷子一塊拿去，自然而然的吃起來，吃完了，起身就走，不僅沒對我說聲謝謝，連看我一眼也沒有。」朱先生一連遇過幾次這種事後，即認定了他們是打抽豐的，當然長期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們也都不會想到，這在中國大陸實在是太普遍的

事，這不但工人如此，高級知識分子也如此，以我在廈門大學為例，同桌的人吃飯，無分男女，也不必相識，只要有人吃不下，他（她）給其他人吃，或他（她）向他人要來吃，都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，從來就沒人會認為羞恥或打抽豐，因為經過了三年大饑荒而餓怕了的人們，已經知道如何節約糧食，不能暴殄天物。相反的平時大家都是每頓一個菜，你要是買了兩三樣菜一個人吃喝，才會遭到人們異樣的眼光呢。朱先生運氣好，是現在到大陸去，換了文革時期，他要是一人在館子裏如此浪費，只怕會被紅衛兵、造反派請到桌子底下丟去砸盤子、啃骨頭呢。

朱先生又說：「有錢能使鬼推磨」這句話在世界各地都很靈驗，唯獨在它的發源地——中國大陸不然，在今天的大陸上，錢不能通神，人才能通神，因此，這句話該改為『有人能使鬼推磨』才切合現實。」筆者認為朱先生只說對了一半，有錢固然在大陸不一定行得通，有人也同樣不然，合適的應該是「有權能使鬼推磨」。

因為大陸是個票的世界，糧要糧票，布要布票，油要油票，腳踏車、手錶、縫衣機等都要工業卷，只有錢沒有票等於白搭，但有權則不然，有權官階高，巴結的人多就有錢，買東西更是方便，只要一通電話，假公濟私，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，正因如此，中國大陸，上自中央，下至地方，無時無地不在爭權，權利鬭爭永無休止。不正是有權能使鬼推磨的寫實麼。

除以上兩篇筆者略表不同意見而外，其他篇章可說篇篇精彩，其中又尤以最後一篇「應以統戰對統戰」最佳，這一篇不僅每個國民該讀，每位黨工幹部更應當讀，因為整本「大陸去來」只是朱先生遊歷觀感的敘述和整理，而最後一篇才是他的嘔心泣血之作，是他對國家前途、民族復興的建言，這絕不是一般參加國建會的泛泛之流可能寫得出來的，我們的國家不只應該注意青年才俊，這種「老頑童」式的才俊也得多注意，當此國家需要人才之際，切不可忽視了他們，以導致他們「換得東家種樹書」的悲觀與落寂。